

权变式反向运动： 社会转型期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阐释 ——Q村个案研究

高新宇,许佳君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分析社会转型期草根农民的环境抗争动因,讨论草根群体、环保NGO、媒体、中央政府等应对污染所兴起的环境保护“反向运动”,探讨了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及企业的理性困惑所造成的“政经一体化”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农民环境抗争的胜利与“反向运动”主体间的互动密切相关;与西方大规模环境运动不同,城郊村落农民环境抗争在依法抗争、理性维权、依势抗争等抗争类型间根据情境切换,呈现出权变的特点。

关键词:环境抗争;政经一体化;权变式反向运动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3-0039-05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1]。社会转型期,中国以经济发展优先,企业未能适时地承担社会责任,诸如环境纠纷、环境抗争、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相对较为突出。相关统计显示,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保持着年均29%的增速,2012年,中国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重特大环境事件频发^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诱因。

一、农民环境抗争何以生成

1. 环境抗争的意涵

环境抗争系指个人或家庭在遭受环境危害之后,为了制止环境危害继续发生或挽回环境危害所造成的损失,公开向造成环境危害的组织和个人作出的呼吁、警告、抗议、申诉、投诉、游行、示威等对抗性行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2]。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急剧扩张以及产业梯度转移,诸多城

市高污染行业开始逐渐转向农村,由此而引发的农民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地方政府过分重视GDP,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农民环境抗争行为逐渐常态化。本文试图回答:社会转型与农民环境抗争之间有着何种关联?中央政府与民众保护生态环境的反向运动如何兴起?

2. 污染凸显:案例村及其环境问题

(1) 案例村概况

本文选取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落—Q村作为个案,详细探析其环境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农民环境抗争。Q村^②地处江淮平原,由两个自然村组成,隶属于B市L区C镇,毗邻国家4A级景区龙子湖—曹山风景区,淮河支流鲍家沟穿村而过(见图1)。2008年Q村共有村民1876人,土地约93.3hm²。笔者及课题组成员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先后4次前往Q村进行调研,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并对Q村环境抗争的“带头人”、地方政府官员、企业主以及环保

收稿日期:2014-09-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YJSCX06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2014/B29714);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KYLX_0412)

作者简介:高新宇(1988—),男,安徽蚌埠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①环境群体性事件[EB/OL].<http://www.baik.com/doc/6944416.html>.

②依照学术规范,本文中村名、企业名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

NGO 志愿者等进行了详细的访谈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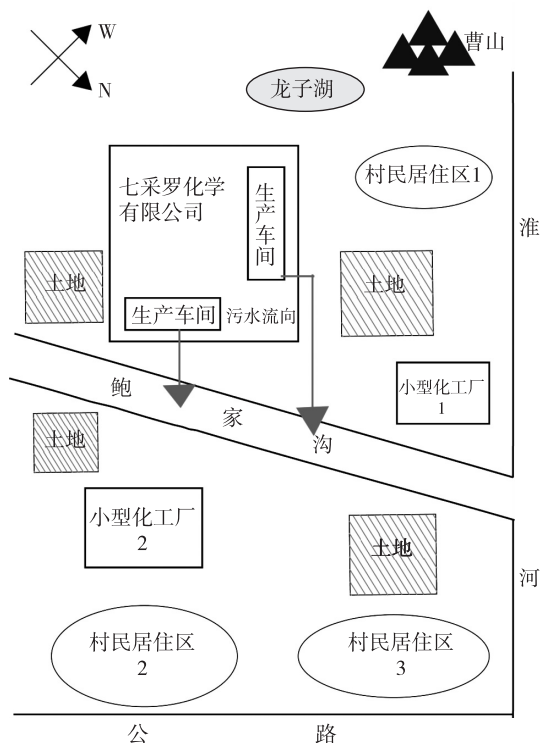


图1 Q村土地及河流与化工企业之间的位置关系

(2) 案例村环境问题

Q 村村民的抗争缘起于以 Q 化学有限公司为首的 3 个化工企业在村内的建立(见图 1)。Q 化学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国营 B 市农药厂,2003 年经过改制,成为了年销售收入达 5 亿元,每年上缴地税上百万的私营化工企业。Q 化学有限公司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生产 3,4-二氯苯胺的企业。自从企业入驻 Q 村开始生产之后,村庄内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

处在化工企业影响下的 Q 村村落环境问题已清晰显现:第一,水体污染与空气污染。水污染来源于 3 个方面:①工业点源污染。每天 Q 化学有限公司生产产生的废水都会通过固定的排污口,不加任何处理地排入鲍家沟与淮河中。②农业面源污染。由于化工企业的影响,村中的农田中氮、磷总量已严重超标,水体逐渐富营养化。③村民生活污水。值得关注的是,在化工企业入驻前,村庄环境较好的时期,村民碍于“熟人社会”中的伦理关系,都十分注意保护环境。但是,当村庄环境遭到破坏后,部分村民出现失望、愤怒、焦虑等情绪,也开始将生活污水等排入河中。造成空气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来自化工厂生产所排放的废气。

第二,噪声污染与土壤污染。工厂实行三班倒工作制,昼夜生产不停歇,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活作息。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于采用村内沟渠、河水浇灌农田以及化工企业生产所释放的粉尘落入田间

所致。

第三,癌症高发。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系认定十分复杂,“癌症—污染”关系的认定即使是权威机构也非常困难,村民的认识更难超越^[3]。重视癌症村的人与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证明污染和健康的联系^[4]。探讨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癌症发病率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超出专业范围,笔者遵循韦伯所说的“实然的陈述”原则,来呈现 Q 村村民的健康危机。依据相关报道与笔者对村民的访谈,自从化工企业入驻投产至 2009 年化工厂迁出,Q 村共有 49 人死于癌症,平均每年约有 10 余人因癌症离世(不完全统计),占村庄总人口的 2.6%,癌症发生率与死亡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吉登斯认为,工业主义是导致现代环境问题的元凶^[5]。正是由 Q 化学有限公司的污染行动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在 Q 村日益凸显,严重侵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侵害了他们的环境权益,所以,反对化工厂污染的环境抗争行动亦即应运而生。

二、农民环境抗争何以进行及其类型诠释

农民在遭受污染侵害时,他们会作何反应?是什么原因促使了他们的集体行动?乡村环境抗争为何困难重重?笔者将以 Q 村村民的抗争轨迹为主轴展开,采用“事件—过程”分析路径,深入探讨村民如何抗争、抗争到何种程度以及抗争的结果等问题,以期获知对农民环境抗争的类型有一个场景化认识和初步结论。

1. Q 村环境抗争事件^①始末

(1) 行动者:村民个体的日常抗争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道义经济”、“生存伦理”与“弱者的武器”居于分析农民抗争行为的中心地位,这些日常抵抗具有如下共同特点:反抗几乎不需要事先计划或准备,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默契和非正式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其避免直接地冲突,象征性地对抗权威^[6]。然而,在当代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农民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城郊村落农民生活条件要略好于偏远山村)斯科特式的抗争方式在当今中国乡村场域发生了变化,体现在村民日常抗争中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更多的显现出理性维权取向。在 Q 村案例中,抗争带头人 ZWL 正式在自家田地被化工厂污染的情况下,通

^①本文的分析对象是中国农民与企业、官员之间极其复杂的社会互动与博弈,它们并不是包含在诸如“小社区—大社会”、“国家—社会”此类的关系结构中,而是通过许多偶然事件特别是冲突性较强的事件才得以充分地呈现。

过交涉、法律途径起诉污染企业,寻求赔偿,但是,由于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初次抗争失败。

(2)政经结盟:污染企业的行动策略

在工业污染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正如张玉林所认为的,地方政府在追求 GDP 和财税收入的冲动和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冲动往往使二者结为同盟。“政经一体化”的格局往往造成的是环境执法的疏忽以及企业成本的外部化^[7]。在地方政府的开发冲动中,环保部门的权力常常被虚置。同样,戴慕真提出“地方法团主义”概念,亦指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与地方社区、企业结成了法团化的组织,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8]。在 Q 村案例中,Q 化学有限公司通过纳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通过建构关系与权力获取地方政府支持,以此应对村民的环境抗争行动,起初,企业还能够与村民理性谈判^①。在谈判未果的情形下,其便采用“拉”与“打”的策略:即花重金利诱村民中的维权精英,期望他们放弃斗争,从根本上分化瓦解农民环境抗争的阵营;采取暴力的方式,威胁恐吓村民,使其放弃抗争。在如此环境下,Q 村的抗争行动举步维艰。

(3)讨说法:农民集体行动中的“情”、“理”、“法”

信(上)访制度是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9]。在 Q 村的环境抗争事件中,共发生过两次集体性的上访行动。一次是在“L 环保组织”^②的帮助下,Q 村抗争带头人 ZWL、YJ 等赴北京将材料递交给国家环保总局以及一些社会名流和有影响力的记者,通过他们将村民的心愿转达给高层,促生了 2007 年的“流域限批”政策,化工厂被关停,Q 村环境抗争取得暂时的胜利。另一次集体上访出现在原本已被关停的 Q 村化学有限公司复产之后,村民有组织有计划地带着“联名请愿书”,高举横幅前往 B 市政府进行请愿,最终在媒体、环保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促使政府下决心,将污染企业迁出,Q 村环境抗争取得最终胜利。反思这两次集体行动,体现出 Q 村民在外界帮助下,综合运用“情”、“理”、“法”的抗争策略,维权行动“理”与“法”的界限之间进行,仔细学习政府文件和相关法律知识,抗争行动“踩线而不越线”,既有“隐蔽的抵抗”,也有“公开的抗争”,最终取得胜利。Q 村抗争经验值得在一向以维稳为主要社会管理目标的中国进行推广。

(4)三维互动:农民、企业、政府间博弈

科尔曼理性行动理论认为,在社会行动中,个人行动者、企业行动者、政府法人行动者的行动原则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10]。在 Q 村案例中,博弈三方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取向,村民环境抗争的

目的是为了获得生态优美的村落环境,企业治污不力的行动原因在于其生产目的即为谋利,地方政府由“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转变,市场逐渐游离于社会,使得乡村环境治理处于两难悖论。面对“政经一体化”的体制性制约、权力与技术的不对称,农民通过正常协商、谈判、诉讼等手段无法实现其环境权利时,他们倾向于采取体制外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维权,以求能突破“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获得自身的环境权益。

表 1 Q 村环境抗争过程及策略

时间	环境抗争所处阶段	代表事件	所采用抗争策略
2005	个体理性抗议阶段	维权精英 ZGL 对化工厂的起诉案	依法抗争
2006	集体理性抗议阶段	“绿满江淮”介入,村民通过多种形式向上反映情况	依情理抗争与依法抗争
2007	无抗议阶段	“流域限批”政策实施后化工厂的短暂停产	
2008	集体非理性抗议阶段	化工厂复产,村民集体联名上访	依势抗争与悲情抗争
2009	事件解决阶段	市政府下文,化工厂迁出	

2.环境抗争的类型

(1)法理型抗争

20 世纪 90 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使用法律作为“抗争武器”来分析农民抗争行为的解释框架。其中具有代表性是以欧博文、李连江为代表的“依法抗争”和以于建嵘为代表的“以法抗争”分析范式。李连江等认为,农民通过援引相关政策或法律条文,通过集体上访等方式有组织的向上级政府施加压力,以期求得冤情的化解和利益的补偿^[11];于建嵘认为,1998 年以后,进入了农民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央政策,并且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12]的“以法抗争”阶段。两种分析范式对国内有关农民抗争行为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解释中国农民抗争的一些特定的领域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当然,亦有一些学者对这两种分析范式进行批评性的讨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路向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由“依法抗争”向“以法抗

①企业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生产行为污染了村庄,他们坚持认为自己通过了环评,且排放达标。他们起初愿意与村民理性谈判,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化工企业尽量避开于村民发生冲突、僵化关系的原因在于该企业位于村落内,许多雇员来自本村,他们一方面需要劳动力的支撑以维持和扩大企业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他们碍于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与乡规民约。他们本身的生产关系嵌入了村庄的社会结构之中,为了生产逐利,不到万不得已,企业也不愿与村民发生冲突。

②“L 环保组织”是一家成立于 2003 年的立足于安徽省本土的民间环保 NGO。”

争”嬗变;于建嵘的分析存在泛政治化倾向^[13]。把中国农民抗争形式发展变化的理解是一种单线进化式的想象,是否与普遍的经验研究相符合值得商榷^[14]。Q村抗争带头人ZGL在自家土地遭受污染时即采用依法抗争的策略,理性维权,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缘由在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格局下、体制制约以及权力关系的不对称。

(2) 情理型抗争

在之后对农民抗争的探索中,“依情理抗争”的研究日益显现。即依照农民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形成的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一套解决纠纷的民间规则,虽未形诸文字,但对生活在同一社会情境下的人而言是一种共享的、不言自明的默会知识进行抗争^[15]。罗亚娟研究发现,苏北地区的农民环境抗争行为存在一般性模式:“依情理抗争”,即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规范和伦理对农民抗争行为影响显著^[16]。在中国传统社会,“天理、国法和人情三位一体”^[17]。农民日常生活中处理纠纷通常受到人情与面子的制约,绝大部分纠纷都会通过调解得到妥善处理,因此,费孝通认为,传统乡村社会是“无讼”的^[18]。前文已述及,村民在初尝污染苦果后,并未选择立即求助于法律,而是自发组织与化工厂谈判,希望其能遵守当地乡规民约,减少对村落的污染,之后村民在谈判未果的情形下,将化工厂的排污口堵住等行动,都体现出情理抗争的特点。

(3) 依势博弈抑或悲情抗争

基于乡镇场域的现实案例,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性解释出现新的框架即依势博弈,包括知势、造势、借势、用势四个方面;之后其又分析了农民在抗争中以自身的“弱者身份”作为抗争武器,博取他人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保护自己^[19]。通过对农民集体下跪事件的实证分析,农民在正式上访渠道无法发挥作用时,只能依靠牺牲自我尊严的悲情抗争方式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以求得问题的解决。Q村民在层级上访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依势抗争和悲情抗争的策略,特别是进京上访过程中,ZGL就是借助“L环保组织”的帮助才将上访材料递交到环保总局负责官员手中。

(4) 权变抗争

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演变以及效果均依赖于行动场域的政治情境,在相当程度上,环境抗争的发展是政府、企业与农民互动的结果,而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取决于个主体自身的利益考量^[20]。如表1所示,Q村村民在不同的抗争阶段,依据当时的社会情景,选择不同的抗争策略,依靠反向运动各主体间密切互动,最终获得了环境抗争的胜利。

三、农民环境抗争何以举步维艰: 社会转型之流弊

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传统、现代、后现代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共同作用,加剧了农村的环境风险^[21]。前已述及,起初,Q化学有限公司的经济行为是嵌入Q村社会结构之中的,为了获取劳动力以及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亦不能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须兼顾村庄的社会关系、熟人伦理以及乡规民约等地方性实践。然而,随着市场化浪潮的侵袭,寻求到权力庇佑的企业越来越不考虑社会效益,原本就属于弱势群体的村民更加边缘化。

中国环境问题发生于社会结构转型、价值观念嬗变与经济体制转轨三大框架内。结合Q村环境抗争个案,拟分析社会转型期城郊村落农民环境抗争困境的原因。

1. 社会结构转型:村落共同体式微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与变化,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22]。由于现代性的都市生活方式入侵农村社会,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变为贺雪峰所说的“半熟人社会”村庄共同体由自然边界、社会边界与文化边界构成。前两种边界比较固定。文化边界影响着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村民环境抗争行动发生时,这两点颇为重要。调研发现,Q村的年轻人普遍思想比较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外出打工的人不在少数。此外,该村位于城市近郊,距市中心也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它所受到城市的辐射影响较其他传统村落更为深远。村落共同体的衰落影响了农民在集体行动时的团结性。在化工厂投产初期,只有零星的反抗。

2. 价值观念嬗变:失范与道德危机

在韦伯所述科层制的“理想类型”中,官员和大型组织的负责人应该排除私人情感,严守组织纪律,以便组织能够高效运转进而实现组织的目标。近年来,官商勾结,利益寻租现象在当今社会日益显性化。

我们镇每年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完不成任务,就会面临着被免职的风险。上级一面要环保,一面又要GDP,作为基层官员,我们其实也很难,有时候,只有先牺牲下老百姓的环境权益了。就算有“官商勾结”那也是上层“大官”的事,与我们这些“小吏”关系不大。(2009年5月3日,对基层官员

L 的访谈)

Q 村个案中,化工厂的老板正是通过与上层官员关系密切而使得污染企业能够顺利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而投产,给村民带来了莫大的伤害,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涂尔干意义上的失范成为现实。

3. 经济体制转轨: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彻底变革了国家、地方与私人的利益关系。首先,1994 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了原有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贴制度,在地方税收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无稳定的税收来源。其次,从省级政府到市级政府再到乡镇,是一种压力型的体制,为了 GDP,地方政府易于只重视眼前利益,把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后。再次,有学者将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方式概括为“晋升锦标赛模式”^[23],地方官员的升迁需要良好的政绩作为资本,且其自身福利也主要来自工商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基于此,企业的投资与缴纳的税收就成了政府的立身之本。最后,地方政府与企业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使得农民在环境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处于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抗争行动也就应运而生了。

四、走出环境抗争困境: 权变式“反向运动”的主体间互动

在市场逐渐脱嵌于社会且对社会造成冲击的同时,同步的“反向运动”也正在进行中。下文将在此基础上分析个案中 Q 村环境抗争所依靠的社会多重“反向运动”。

1. “草根群体”:环境污染的抗争者

作为“草根群体”的 Q 村村民,亦是乡村环境保护性“反向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内心有着强烈的反抗愿望和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该群体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乡村工业污染的危害。

在 Q 化学有限公司复产后,对我们村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2007 年 7 月 1 日,前任村主任叫我和 ZGL 去开会,商量起草给市领导的请愿信,我们挨家挨户通知,第二天去区政府上访,希望化工企业搬迁或转产。(2009 年 5 月 2 日,YJ 访谈)

之后,在“环保组织”的帮助下,借助媒体的宣传,最终迫使化工企业搬离村庄,取得了环境抗争的初步胜利。之后,地方政府出资 2 亿元对 Q 村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对鲍家沟实施清淤和生态恢复工程,Q 村民生活环境的恢复指日可待。

2. 环境保护 NGO:环保运动的培训者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环保 NGO 开始在中国兴起,据统计,我国各类民间环保社团约为 3 000

多个。在企业与地方政府对污染治理双重失灵的情境下,环保 NGO 介入乡村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环保 NGO 的使命之一就是普及环保知识,帮助遭受环境污染的村民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协助他们进行环境维权,使这部分弱势群体能够更好地得到国家环保政策的关怀,促进当地环境问题的解决。(2010 年 6 月 3 日,“环保组织”志愿者 RJW 访谈)

在本文上述个案中可以发现,“L 环保组织”一方面,通过与媒体合作,曝光 Q 村的工业污染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另一方面,采用培训、交流等方式,提升当地村民环境维权意识与能力,积极培养维权“带头人”—ZGL,YJ 等;此外,该组织还积极联系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 Q 村的污染数据进行检测、化验,为之后的环境抗争胜利夯实了科学基础。

3. 媒体:环保理念的传播者

科学和大众传媒,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知识、环境危机以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4]。在保护环境的反向运动中,媒体是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中央媒体的支持性报道更是成为农民环境抗争运动的关键性资源^[25]。纵观本文的个案可以发现,当 Q 村的环境抗争陷入困境时,媒体的曝光所产生的舆论压力推动了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例如,新华社记者偶正涛将在淮河流域暗访到的水污染情况写成内参,呈报给中央高层批阅,直接促成了 2007 年淮河“流域限批”等环保风暴的生成,加速了乡村环境污染的解决。

4. 乡村环境保护反向运动主体间互动关系

如上所述,具有多重反向运动主体的社会反脱嵌行为日益兴起。一方面“草根群体”(Q 村村民)在环保 NGO 的帮助下,逐渐习得专业环保与法律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污染企业抗争的知识资本;另一方面,在媒体的宣传和关注下,Q 村的环境问题得到高层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最终得到妥善的解决。Q 村环境抗争的胜利依赖于村民,环保组织以及媒体这三种反向运动主体间的密切配合。

余论:权变式反向运动会持续吗?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剧变,自发调节的市场力量把伦理社会演变为市场社会。在市场社会中,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哲学给乡村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陷入了康德式的二律背反窘境: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究竟应该何者先行?前者会使乡村的环境进一步恶化,易造成民怨沸腾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后者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当前“政经一体化”体制格局下,短

期内难以实现。在此吊诡的情形下,农民反映自身诉求的环境抗争也就应运而生了。再者,现代社会充满各种风险,俨然已成了风险社会,在自身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市场的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多方主体参与的,旨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反向运动,使得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与伦理关系之中。

不同于西方大规模的环境运动,当代中国城郊村落的环境抗争具有权变抗争的特点,即农民在环境维权过程中,根据各种变化的社会情境选择不同的抗争策略。个案中,村民在抗争伊始,选择的是“依法抗争”,失败后,在环保 NGO 和媒体的帮助下,采取“理性维权”、“依势抗争”的方式。之后,在化工厂复产后,村民的上访集体行动又显示出了“依气抗争”的特征,最终取得了环境抗争的胜利。在追赶现代化的同时,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发展,亦要重视环境保护与环境伦理^[26],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双向发展。唯如此,无论环境保护运动是哪种类型,农民的环境权益同样可以实现,社会依然可以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2):10-19.
- [2] 陈涛.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3-43.
- [3] 陈阿江,程鹏立.“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J].学海,2011(3):30-41.
- [4] 王五一,叶敬忠,张世秋.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5] GIDDENS A.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M].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 [6]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J].社会,2008(3):34-58.
- [7] 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J].探索与争鸣,2006(5):26-28.
- [8] 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J].社会学研究,2010(2):30-43.
- [9] 童星.完善信访制度,推进政务公开[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2):12-14.
- [10] COLEMAN J S.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of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15.
- [11] 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C]//吴毅.乡村中国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18.
- [12] 于建嵘.当代农民维权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2):49-55.
- [13]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2):1-24.
- [14] 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5):21-45.
- [15] 陈占江,包智明.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98-103.
- [16] 罗亚娟.依情理抗争:农民抗争行为的乡土性:基于苏北若干村庄农民环境抗争的经验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6-33.
- [17] 范忠信,郑定,詹学农.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9-25.
- [18]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9]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J].社会,2008(3):34-58.
- [20] 王军洋.权变抗争:农民维权行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以生态危机为主要分析语境[J].社会科学,2013(11):16-27.
- [21] 王芳.转型加速期中国的环境风险及其社会应对[J].河北学刊,2012(6):117-122.
- [22] 陆学艺.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J].社会学研究,1995(2):3-11.
- [23]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24] 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M].洪大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25] 童志锋.变动的环境组织模式与发展的环境运动网络:对福建省P县一起环境抗争运动的分析[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86-93.
- [26] 田海平.环境伦理与21世纪人类文明[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5-19.

